

學苑出版社

周玉良主持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九五”规划

国家级重点课题

中国地方

教育史研究

北京教育史

主 编 汤世雄
执行主编 俞启定



周玉良主持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九五”规划

国家级重点课题

中国地方

教育史研究

北京教育史

主 编 汤世雄

执行主编 俞启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教育史/汤世雄主编. 俞启定执行主编 --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11.12(2012.8重印)

ISBN 978-7-5077-3918-3

I. ①北… II. ①汤… ②俞… III. ①地方教育—教育史—北京市 IV. ①G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59037号

责任编辑:韩继忠 任 彧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78944、67601101(邮购)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厂:永恒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850×1168 1/32

印 张:20

字 数:500千字

版 次:2011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2012年8月第2次印刷

定 价:120.00元

绪 论

(一)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市中心位于北纬 39 度 56 分，东经 116 度 20 分。北京地处华北平原和燕山山脉交界处，西部山地统称西山，属于太行山脉；北部山地统称军都山，属于燕山山脉；中部和东南部是缓缓向渤海倾斜的平原。1949 年 1 月，北平市人民政府成立时北京区划面积 707 平方公里，自 1958 年至 2010 年北京区划面积基本定型为 16410.54 平方公里。北京的行政区划范围历经调整，特别是 1996 年 5 月至 2001 年 12 月，北京市将 10 个区 8 个县变更为 16 个区 2 个县的格局：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海淀区、门头沟区、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大兴区、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县、延庆县；2010 年，崇文区与东城区合并为东城区，宣武区与西城区合并为西城区，北京市形成 14 个区 2 个县的格局。2010 年 11 月，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北京市常住人口为 1961.2 万人，其中外省市来京人员为 704.5 万人，占常住人口的 35.9%。

北京是早期人类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和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在京郊房山区的周口店发现有距今约 50 万年的“北京人”化石和距今 15 万至 1 万年的“山顶洞人”活动遗址，新石器时

代的考古发现更是星罗棋布。北京最早见于文献的名称叫做蓟，在商朝业已存在。公元前 1045 年，周武王灭商后封召公于燕地，召公长子克到燕地就封，这年也就被视为北京建城之始。近年考古发现，西周燕国都城位于北京房山区琉璃河镇东的董家林村。此后，中国无论是处于统一还是分裂割据的时代，北京都是华北地区举足轻重的都邑。辽金两代，北京成为中国北方朝廷的都城，元代以后，更是成为统一的中国首都。

汉武帝元朔五年（前 124），诏令朝臣商议兴办学校事宜。丞相公孙弘等人联名上奏，指出：“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史记·儒林传序》）从此以后，处于天子脚下的京城就被誉为“首善”之地。也就是说，它是全国的文教中心，设有最高学府——太学（后来又称国子监），面向全国培养和选拔精英人才。首都的教育是最发达的，应当为天下树立表率 and 提供示范，起到教化的辐射和推广作用，这才无愧于“首善”的地位。

中国历史上曾作为首都的城市不少，北京是定都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已达千年以上，超过西安、洛阳、开封、杭州、南京这些历史故都。从公元 938 年辽太宗以幽州为燕京算起至今，北京不是首都的时期仅有明代初期的 35 年和国民党统治的 22 年，还可以算上辽金之际的 31 年和金元之际的 49 年。可以说，从中国封建社会中期至今的千余年间，北京基本上是作为“首善”之地，教育事业虽未见得总是最先进的，但始终处于全国领头地位。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北京处于多民族杂居的地理位置。商、周时期，北京地区就有肃慎、山戎、燕、亳、奚等民族部落。秦汉以后，北京是中土与塞外各民族沟通交汇的重要枢纽。随着北方各民族大量内迁，民族交往也越来越密切。从西晋

灭亡到隋朝建立近 270 年间，燕蓟地区先后处于匈奴、羯、鲜卑、氏族政权统治之下，其中鲜卑拓跋氏政权（北魏、东魏、北齐、北周）就有 180 余年。五代以后的千余年间，北京作为辽、金、元、清的少数民族统治政权的首都，更是长达 700 年之久，可见汉代以后的北京多半时期是在非汉族政权治理之下的。古代非统一时期的一些汉族政权，例如东晋、南朝、北宋和南宋，疆域都不及北京地区。处于民族间政治斗争和文化融会旋涡的中心，北京的教育事业也必然具有受多民族影响的开放性、融会性特色。

（二）

北京古代教育的历史可以辽代为界，此前的北京是北方重镇，只有地方性的教育设施；此后的北京则基本上处于首都的地位，这里既有中央政权举办的全国性教育设施，也有本地的教育设施。

教育活动与人类发展共生。北京地区人类活动可追溯到数十万年前。在漫长的史前时代，尚无专门的教育机构，教育活动蕴涵在生产和社会活动中。教育内容以传授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为主，同时还要培养人们遵守社会生活准则，掌握必要的行为规范。从考古发现可知，到商、周时期，北京地区的人类文明已相当发达，文字的应用导致专门的学校教育的产生。北京作为从西周到春秋战国延续 8 个世纪的燕国国都所在，创立了丰富多彩的燕文化，学术和教育活动曾盛极一时，在全国别树一帜。

从汉到唐，北京始终是北方重镇，还多次成为分封的诸侯国乃至地方割据势力的行政中心。在统治者尊崇儒学、推行教化的

政策指引下，北京地区的官学、私学及学术传播活动都有显著的发展。即便是在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也不乏积极兴学的举措。由于北京处于中原与塞外民族交锋的前沿，军事活动占重要地位，乱世时更是兵家反复争夺之地，政局难以长期稳定，故官方兴办教育不如文化发达地区。民间教育则很活跃，特别是一些世家大族的家学，如范阳卢氏、祖氏，北平无终阳氏，渔阳雍奴高氏等，都是世代相传，学术成就显著的家学。

辽代北京是“五都”之一，称为南京，但地位特殊，传统属于中土，汉民居多，文明程度高，又是处于与北宋对峙的前沿中枢，因此更加需要文武并重，尤其是借鉴中原王朝的教育和选士制度来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包括吸引宋朝士人归顺。辽代中央官学——太学就建在南京，科举考试也主要是在这里举行，析津府地方的各州县亦设学，辽南京可谓文教中心，对全国产生辐射作用。

金代北京称为中都，是名副其实的首都，更是成为整个中国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金中都设有完整的教育体系，包括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国子监及其所属的国子学、太学，以及燕京的大兴府学和各府州县。与辽代“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分治政策不同，金代不仅允许而且鼓励女真人接受汉族文化，为此还专门设立了女真国子学、太学和地方女真学，均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还仿唐代刊刻石经立于国学。金代办学以官方为主，也不仿效宋朝兴办书院，民间只有一些私人讲学活动。金代的科举已形成定制，对女真考生有一定的优惠。

元代北京称为大都，不仅是元帝国的首都，还是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各汗国的中枢，成为多元文化汇集的地方。占支配地位的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而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各种文化也在尽量发挥各自的影响。元朝统治者采取兼容并蓄的态

度，反映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就出现了传授中原学术的国子学，与传授本民族文化的蒙古国子学和传授西域文化的回回国子学并立于元大都的局面。今位于北京安定门的国子监和孔庙建筑，就是元代兴建的。国子学采用积分升斋的办法，教学制度趋于规范化。在燕京还兴办起北方第一所书院——太极书院。元代地方普遍设学，除儒学外还有医学和阴阳学，在乡里基层还设立了社学。元代中叶后才开科举，且历经废兴，但以程朱理学为选士标准，为后世明清所继承。

明代最初建都于南京，明成祖夺位后以北京为首都，今北京城的规模就是定型于明代。明代的学校教育体制基本建立，中央有国子监（太学）及各类专业学校，地方府州县设立儒学，且与科举高度衔接，士人须先考入地方学校取得生员身份，再通过学习、选拔获得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京城只设顺天府学（含大兴、宛平两个县学），京郊各州县普遍设学，基层还有社学。明代书院几兴几废，京城直到明末才有东林党人办起首善书院，不久亦被取缔。明代科举正式考试有乡试、会试和殿试，北京贡院是顺天乡试和会试的场所，规模宏大。

清军入关后，即定都北京。清代基本上继承了明代的政治架构和文教政策，包括学校和科举制度，同时注重维护本民族的统治优势。北京内城全由八旗居住，京郊田产也多为旗人拥有，可以说整个京畿地区都是旗人占支配地位，这是清代北京的一个重要特点。清廷为京师八旗子弟专门设立学校，有面向全体八旗子弟的八旗官学和义学，为皇族办的宗学、觉罗学，为内务府三旗子弟办的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和为护军营官兵子弟办的圆明园官学、外火器营官学、健锐营官学等。培养涉外人才的俄罗斯官学、回疆官学也只招收八旗子弟。八旗学校既学习汉族传统的经史之学，也学习满语和进行骑射训练以保持本民族传统。清代国

子监、顺天府学和各州县学设置相当健全，京城建有金台书院，各州县也多有书院，此外还办有一些义学。清代科举制度高度完备，京师准考及录取名额均比外地占有优势。

(三)

西方列强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活动领域尚限于通商的五口。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北京被迫开放，急需外交人才，于是官方举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建立，此后西方传教士也进入北京办学，早期的教会学校有育英学堂、贝满女学堂和潞河书院。戊戌变法期间兴办的京师大学堂是清政府兴办的最高学府。在近代教育开始传入中国的数十年间，新式学堂在外地不断兴办，而北京响应寥寥，明显滞后，这恐怕也是首都的特殊地位决定的。1904年新学制颁布，次年废止科举，从体制上宣告旧教育终结，北京作为首都，是新教育中枢（学部）所在，又开始发挥引领作用。京师督学局本来就直属学部，推进新式学堂的创办相当得力。八旗学务处也是设立最早的教育行政机构，更有其良好的办学基础，行动也早，很快就实现了八旗学校的全部改制，普及程度之高在全国领先。北京地方的公立学校也有计划地兴办起来，并进行了全市性的私塾改良。各类高等专业学堂、师范学堂也纷纷兴办，还有以“庚款”退还而建立的清华学堂。到清末的短短几年间，北京的近代教育体系已基本建立。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也倾覆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中华民国始建于南京，制定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教育方针和学制体系。但随后政权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之手，仍然定都北京。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企图破灭后，北京成为新文化运

动的中心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教育改革全面开展，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革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北洋政府时期北京教育继续发展，开始普及四年的国民小学教育，并大办简易学校为失学青少年补习文化。中学也进入实际发展阶段，但增办的主要是私立中学、教会中学以及高校附中，由1912年的7所发展到1928年的42所。中学毕业生逐年递增促进高等教育的大发展，清华学堂正式成为综合大学，师范、农业、交通、法政、医学、工业等国立专科学校均升格为大学，教会办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以及民办中国大学、中法大学等也很有实力，此间还先后兴办过30余所存在时间不长的大专院校，北京的高等教育在全国名列前茅。此间由于军阀混战和政局频繁变动，特别是教育经费一直困窘，也影响教育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执政时期，北京改为北平特别市，但文化古都的教育优势仍然存在。30年代前期，北平政局相对稳定，教育发展的环境较好。继续推进小学义务教育，1936年北平6到12岁儿童毛入学率达到47.8%，同时通过大办短期小学使失学青少年都能接受基本教育。中学教育继续发展，到1936年有市立中学7所，在校生2451人；私立中学60所，在校生20937人。教育部门落实国民政府制定的中小学课程标准，进行教师资格检定，一些中小学积极开展教学实验，教学质量有了明显提高。高等学校经过整合，实力大有增强，到1937年，北平有国立大学和学院5所，公立专科学校6所，私立大学和学院10所，专科学校2所，学科建设也达到较高水平。其中蒋梦麟执掌的北京大学、梅贻琦执掌的清华大学，以及司徒雷登执掌的燕京大学和陈垣执掌的辅仁大学，办学颇有特色，卓有成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京被日寇占领，教育事业遭到浩

劫，学校设施损失严重，许多被迫停办。国民政府将一批公立高等院校内迁，在大后方坚持办学。北京日伪当局对学校实施严密控制，通过各种手段推行奴化教育。广大爱国师生在日寇的淫威下坚持民族气节，抵制奴化教育，支持抗日活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平西抗日根据地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仍注重发展教育事业，依靠群众的力量积极兴办抗日小学，成人社会教育也开展得轰轰烈烈，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斗争。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光复北平，接管教育机构，原来内迁的高校也陆续回归，教育事业得到恢复，特别是公立中小学得到较快发展，1948年，全市有市立小学235所，私立小学121所，公立中学15所，私立中学49所，职业学校15所（公立5所，私立10所），国立大学3所（北大、清华、师大），私立大学4所（燕京、辅仁、中法、中国），国立独立学院1所（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私立独立学院3所（朝阳学院、华北文法学院、协和医学院），国立专科学校1所（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市立专科学校1所（体育专科学校），但国民党当局力图实施一党专制的政策也激起师生激烈反抗。内战爆发后，北平进步师生开展了持久不息的爱国民主运动，最终迎来北平的解放。

（四）

本书从北京地区教育发端的远古开始，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当代北京教育史拟在今后条件成熟时继续撰写。如果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算起，本书记载了历经数千年的北京教育发展历程，时间跨度长，教育类别众多，发展演变绚烂多彩。特别是北京自辽代以后基本上处于首都的地位，国家教育政策、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以及国立最高学府均出自于此。位于“天子

脚下”的北京地方教育也有其不同于外地的独特之处。例如，明清时京城内就没有区县级官学，统归于顺天府学，在规模和待遇上显著优于外地府学，而民办书院则大受限制；清代顺天府专设提督学政（早期由府丞兼任）掌管学校和科举事宜，清末建立的京师学务局直辖中央学部而不是地方当局；等等。总之，北京教育受中央政权控制和关照的色彩更浓厚，教育实施注重规范性、高标准，以体现对全国的示范性。

因此，北京教育史虽然属于地方教育史，但是和一般的地方教育史相比又有明显特色。本书除尽力考察北京地方教育的历史发展外，对北京作为首都时期中央政府的有关教育举措设施也予以充分的阐述，它毕竟也是发生在北京地区。由于历史上专属于北京籍贯的教育家不多，虽然也不乏外地籍贯的教育家居京时发表的教育论述，但为了避免与有关地方教育史重叠，本书未涉及教育思想史领域的专门研究，只是在考察教育制度和教育活动的过程中介绍到相关人物及思想观念。

古人云，治史以求真为宗旨，以实录为基础。历史研究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客观、公允上。本书遵循这样的原则，行文以阐述北京教育的史实为本，适当加以概括性的归纳，而不做无有效史料支撑的发挥，也不做超越历史条件的评点和生硬的联系现实，只求通过尽量翔实的历史素材来反映北京教育发展的历史线索。至于如何评价、分析以及古为今用，当留待读者自己去体味。

为更好地展现历史上的北京教育，本书收集选用了200余幅图片作为彩页和随文插图，其中既有历史旧照，也有以实物拍摄的照片，大多数是发生在北京地区的有关教育图片。鉴于北京拥有悠久历史的教育机构众多，校史资料积累丰富，本书难以照应周全，故主要选用在历史上有突出地位的教育设施特别是能切实

配合书中相应内容的图片，尽量避免偏重展现某个教育机构而导致失衡。

由于编写者的认识水平有限，精力的投入和资料的发掘把握还不够充分，书中挂漏及偏颇之处在所难免，还有因多人分工执笔而导致各章内容及结构方面的均衡欠缺，以及选图和图文配置的失当。在此诚恳期待专家及广大读者批评赐教，也期待本书能为推进北京教育历史研究和为推进北京教育改革与发展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北京教育史》编写组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名誉顾问	何东昌	邹时炎	杨海波	徐锡安
	陶西平			
顾 问	王日新	王炳照	田正平	江 铭
	郭福昌	黄定元	阎国华	潘懋元
主 编	周玉良			
副 主 编	汤世雄	宋恩荣		
委 员	王豫生	方 骏	冯象欣	齐红深
	刘文璞	安效珍	李才栋	李定开
	杨进发	张凤民	张 彬	陈乃林
	陈光华	金汉杰	赵关忠	赵宝琪
	俞启定	姜树卿	高 志	徐毅鹏
	符康荣	傅九大	蒙荫昭	蔡寿福
	熊贤君			

《北京教育史》编纂工作人员

主 编 汤世雄

执行主编 俞启定

编写人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刚 王 倩 任 彧 孙 越

孟祥辉 林 业 郑军平 周凤华

施克灿 耿 申 魏 强 周慧梅

主 审 李晓秋

责任编辑 韩继忠 任 彧

责任校对 王永刚 马志鹏

图片编辑 俞启定 任 彧

总 序

在这世纪更迭、千年转换的历史性时刻，我们奉献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国家级重点课题。本项研究是由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牵头，在中央及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大力支持下进行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规划，按行政区划组织力量开展的大规模的、系统的关于地方教育史的研究。这一研究的开展，是中国教育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教育史作为一门学科，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初创到发展、兴盛的历程。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在清除极左思潮干扰，端正学科研究方向，系统搜集、整理、积累资料，拓宽研究领域，深入开展专题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有力地推动了教育史学科的建设，使中国教育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科学体系，成为教育科学领域里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一门学科。

从以往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成果来看，关于古代教育史的描述，多为汉族聚居、文化发达的黄河中游、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历代居于政治中心地带的教育状况，近现代教育史研究则较为注重京、沪、宁与东南一带新教育产生的地区。这种侧重，自然有其合理的因素，因为这些地区一般来说代表了当时全国教育发展

的水平与主流。但是，过去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忽视了其他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以及各民族教育交流融合的历史，因此还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如实地反映整个中国教育史的全貌。开展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试图弥补这一不足。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延伸与加强，而不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简单诠释或地区性缩微，应有新的发掘、新的创造。研究地方教育史，需对中国教育史的总体发展脉络有宏观上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充分地展现出各地区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历史特点、地域特色。其研究的对象、范畴与方法，与中国教育史研究相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处。它既要反映中国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共性，更要揭示地方教育发展的特殊性与个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方特色是地方教育史的生命，紧紧抓住“地方”二字是进行这一研究的关键。

地方教育史是研究教育现象的空间与时间组合的学问。从广义上讲，它应归属于“地域文化”的研究范畴，是介于教育学与地理学、历史学之间的交叉学科。

研究地方教育史，自然会涉及各地教育发生、发展与本地区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会影响到人类的生存状态，进而对人们教育的模式、程度、内容与方法，对民俗、民风，对人的气质、性格、品位、情趣的形成以及人才的数量与分布等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关于这些，我国的古籍中早有记载。自然环境同时也影响着一方的文化艺术、宗教信仰、民居建筑，这些又都是教育的外部条件，间接地影响着地方教育的发展。至于人文环境、社会结构对教育的影响，应当说更为直接、更为广泛。诸如区域历史文化变迁中经济的升沉消长、政治的争斗沿革、文化的滋生变异、